

## 火把照耀过的红色小镇

徐 鲁

有一个动人的场景，不时地在我脑海里浮现——

电闪雷鸣之夜。茫茫的幕阜山群蜿蜒无边，电光不时映照出天边巍峨的山影和丛林。透过沉沉夜色，一支年轻的红军队伍，在崇山峻岭间匆匆赶路。他们有的戴着斗笠，有的披着蓑衣，大多数人的单薄军衣已经由灰色褪成了白色。大雨滂沱。后面的战士紧踏着前面战士的脚印，默默无声地前进。有人满脸泪水和雨水，抱来被雨水湿透的白获，覆盖住倒在路边的战友的遗体，雷雨中是匆匆的含泪的敬礼与告别。一双双穿着草鞋的脚踩过红土地上的泥泞。雨水、汗水、泪水交流在一起。闪电映照出一张张年轻而坚定的脸庞，映照着他八角帽上的闪闪红星……

这是发生在八十多年前的一幕。1929年秋天，苦久不雨的鄂南山区，连日来暴雨如注，有若翻江倒海一般。这也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震惊中外的蒋桂军阀战争爆发。10月间，以彭德怀为军长的红五军，派出由纵队长李灿和党代表何长工率领的红五军第五纵队为先头部队，毅然挺进幕阜山区，开辟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使湘赣苏区和鄂东南苏区南起井冈山、北抵长江连成了一片。翌年五月，三十二岁的彭德怀率领转战湘鄂赣边区多年的红五军主力，宛如一支不可阻挡的铁流，也开进了鄂东南苏区的中心、地处鄂赣两省交界的要塞小镇龙港。

革命，就是这样响应着人民和时代的呼唤，肩负着一个个艰辛的使命，一步步在风雨中向前挺进。龙港这个偏僻而陌生的小镇，从此便同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为当时湘鄂赣边区鄂东南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被誉为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小莫斯科”。

那时候，中国大地上也许还没有几个镇子能像龙港那样，聚集着那么多的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今天在“湘鄂赣边区鄂东南革命烈士陵园”纪念馆里，镌刻着数万烈士的名字，而以龙港籍的烈士最多。烈士多的地方，寡妇就多；寡妇多的地方，孝子也多。一位当年在红五军领导革命的老前辈说过：革命选中了龙港，真让龙港受苦了！他们的祖辈倒下了，父辈又紧紧跟上；父辈倒下了，又站立起了孙子这一代。风风雨雨，情怀不改，痴心不变。中国革命，也是被我们的人民用铁骨铮铮的肩膀和永不屈服的脊梁背负着，一步步走向它的明天的。

斗转星移，柳色秋风。长相忆，在龙港……

在镇上老街的一条深巷里，我走进一间古旧的房子。这是当年彭德怀军长进驻龙港时的起居室和办公室。一盏马灯，一张简易地图，一双草鞋，一架简朴的木床，加上一颗赤诚的丹心，这位要饭、打柴出身的革命家，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极其难忘的一段岁月。

在《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我看到了这位出身农家、毕生铁马冰河、著尽征衣的共和国开国元勋，对1930年夏天的回忆：

“……进至阳新县龙(港)燕(厦)区，该地群众对红军的热爱，比平江群众有过之而无不及。外地红军到达该区，均不愿离开。群众对伤病人员之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沿途欢迎红军的口号声、歌声、锣鼓声，响彻云霄。当年天旱，苦久不雨。可是红军路过，茶水满布，宿营用水煮饭，亦不感困难。妇女老小，人手一扇，站立道侧，替红军扇凉。到宿营地时，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开好铺，他们自己露宿，决不让红

军露营。在营地终日歌声、口号声不绝于耳。不间断的宣传鼓动，对敌军一层又一层地警戒，封锁消息，保护红军。粮食缺乏，农民将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薯丝、玉米、稻米，自动地送到各部门口，倒在桶里就走了……”

重读这段凝结着一位开国老帅充满感激之情的文字，我感到，这是英雄的龙港父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中国革命的史诗中写下的一阙无言的华章。鄂南的酷暑是有名的，当地百姓却妇女老幼人手一扇，站在路边为红军队伍执扇凉！这已非一般意义的鱼水情恩。相比之下，孟子所称道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景象，显得何其遥远了。

事实上，早在1925年底，龙港人民的一位优秀儿子肖作舟，就带着共产党的指示，从武昌甲等工程学校回到故乡，秘密串连，在龙港这片地火奔突的山乡，播撒了第一颗革命火种。不久，全县第一个党支部在龙港宣告成立，成员有肖作舟、张召红、刘岐山、华鄂阳等人。紧接着，龙港第一个农协协会也秘密成立。龙港地区党的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的张召红，当地人称“麻子红”，当选了第一届农协主席。从此，这个苦大仇深的农民之子的生命，便和共产党、和龙港的革命事业紧紧地连在了一起，直到英勇就义。

在茅草茂密的南山垅山谷间，我们看到了当年党组织召开秘密会议的一个山洞。洞壁上，煤油灯熏黑的痕迹历历可见。领我们进入这个山洞的，是曾经担任过龙燕区苏维埃主席的刘南川烈士的儿子刘正峰老人。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了，当年他还是个小孩子，曾多次借打猪草、砍柴为掩护，为藏在山洞中的亲人们送饭送水。他告诉我，他这一生，最挂牵的就是这个山洞，通向这个山洞的好几条秘密小道，都是他今生今世永远不能忘记的。他熟悉山洞上的每一块石头、每一股泉水、每一个树桩。是啊，谁能够想到，影响着龙港历史的一个开天辟地的武装暴动计划，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茅草深掩的山洞里形成的。

农民暴动的枪声震惊了古老的山坳，也唤醒了幕阜山区如沉默的火山一般的劳苦大众。他们追随着那些革命者，在百谷通源、千溪分注的崇山峻岭之间，奋斗、抗争、寻找、转战。他们响应着一个开天辟地的号令，毅然拿起了梭镖和红缨枪，把生命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一个个前仆后继而不屈不挠，最终在血与火的山岭间踏出了一条武装割据的道路。热血与烈火，映红了幕阜山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告密与屠杀，封山与搜捕，石头过刀、草木过火的白色恐怖，吓不倒坚强的共产党人，也剿灭不了劳苦大众对共产党的拥戴。威武不屈的龙港人民，就像金竹岭上的楠竹和金竹一样，百折不弯，坚韧不拔。先烈们用生命之火点燃的革命火把，已经燃遍了整个山乡。经受了大革命锻炼的龙港父亲老亲，以强大的信念等待着，呼唤和憧憬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终于，红五军到来了。龙港人民以全部的热情和力量，投入到了拥军护红之中。母送子，妻送郎，细妹送细哥……送自己的亲人参加红军，成了当时龙港人最大的自豪。妇女们组成了一支支洗衣队、唱歌队、护理队；“红孩子”们肩扛红缨枪，守护着山头的“消息树”，鲜红的大旗下也飘扬着一面面少先队和儿童团的旗帜。

当时，龙港的乡亲们倾尽自己全部的深情和力量支援着红军、支援着革命。他们帮助红五军建立起了一所后方医院、一所残疾

军人医院，还有一所中医院。多少人爬山过涧去采来草药，救治着红军战士们的创伤。然而，战争是残酷的，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也使多少年轻的伤病员失去了最后站起来的机会。于是，伴随着这一座座医院旧址遗留下来的，便是一片片掩埋着红五军战士和赤卫队员们忠骨的墓地；白岭烈士墓群，骆家梁烈士墓群，鹅塘堰烈士墓地，岩泉烈士墓群……一片又一片被岁月的荒草掩盖了的墓群告诉我们，将近三千名红军战士的英灵，默默地躺在这里，除了少数几块小小的残存的石碑能告诉我们那些长眠者的名字和身份，其余的连他们的名字和籍贯都无从知道了。

鄂南的阳新县被人称为“烈士县”，单看留在龙港大地上的那片烈士墓群，便能感到“烈士县”这个称号的重量了。当先烈们的尸骨也化成了红色的泥土，我们轻轻走过这片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只有一片片白茫茫的荻花，在强劲的朔风中萧瑟摇曳；一簇簇洁白的山茶花，在墓丘之旁向我们点头致意，宛若先烈们不朽的英魂，在祝福着我们这些幸福地活在今天的人！

在骆家梁，我们听说了一位老婆婆的故事。当红军的丈夫躺倒在这里时，她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小媳妇。从那时起，她便年年守护着这片墓地，年年清明带着孩子前来祭扫，在每一个坟头上撒下纸钱，插上纸幡。秋去春来，风风雨雨，一群世界上最好的人，永远地活在她善良的心上。我们的人民用自己的心灵，用深厚的泥土，庇护着这些曾经浴血奋战的先烈的忠魂。没有高大的纪念碑，没有辉煌的墓志铭，人民就用不尽的哀思和怀念的深情建造起一座座“非人

工的纪念碑”，矗立在龙港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

1934年春天，在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表扬说：“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那真是光明的时期，那又是黑暗的时期；是希望的春天，又是失望的冬天。当时无论是哪一级的干部，无一例外都是一双麻鞋、一顶斗笠、一挂蓑衣、一盏风灯，或者一枝松明子……高山急流、寒冬酷暑，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的足迹踏遍了龙港的山山水水，他们把党的温暖、革命的信心和胜利的消息，送进了每一位贫苦工农的心中。他们是火把的传递者，他们自身也是一支支火把。当时乡亲们称赞他们是“不要家、不要钱、不要命”的百姓官，称苏维埃政府是干净、实在的“提包政府”。倒也是呢，自从共产党人来到龙港地区，人们所看到的共产党人，全都是这个样子。

徜徉在今天的龙港镇上，想象着和缅怀昨天故事，我想起了卡尔·马克思的那段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龙港，你这把照耀过的红色小镇，请让我向你英雄的土地，向你鲜血染过的山冈与河滩，向你旗帜飘展过的老街与深巷，向你迎送过红军队伍的每一条山道、每一个小村……献上最崇高的敬意！



云心出岫(中国画)

蔡键如

大地

写信的人现在大概不多了吧，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写日记，也许就更少了。但书信和日记，其价值却不因写的少而消失。

书信和日记，都带有私家著述的性质。书信写给一个人或一家人，日记写给自己。在古代，书信往往是写在简牍上的，所以又叫“尺牍”。林语堂曾把日记、尺牍与论文加以比较，说得很有意思：“论文材料是天子王侯、部长科长之事，尺牍材料是朋友借贷、感兴抒情之事，日记材料是朝夕会谈、中夜问心之事。故论文公，尺牍私，而日记私又私。”

“私”之一字，可以说是书信和日记一个重要的特色。这两种文体，在写作时，都是不拟公开发表的，至少在许多作者生前是这样的。晚清文史学家李慈铭活着的时候，常将他的《越缦堂日记》借给人看。所以鲁迅揶揄他说，越缦写日记时就预备付印的。书信和日记，如果写的时候就想着公开发表，那么与别的著作就没有什么两样了，作者于无意中难免加意矜持，这样一来便失了天然之趣，也就损伤了书信与日记的命根。因为人在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有些不同。当然，名人的书信和日记，在他身后出版，以供研究之用，那



世说心语

## 书信与日记

田之章

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私”，所以“真”。别的著作里不记事、不说的话，在书信和日记里，可能无所顾忌地记得更加真切、更加真实。黄虎痴编《明人尺牍墨华》自叙云：“短柬片札，亲手自书，或言国政，或言友情，或言家常，琐屑极细极微之事，大抵皆仓卒濡毫，不假修饰。寥寥数语，流落人间，而其人品之醇醪，性情之邪正，往往于无意中流露而出。则以言观人，莫尺牍若也。”这“流落”与“流露”的词儿，甚为有趣。一个是说明这些书信不是预备发表，而是作者身后不由自主地风流云散；一个是说其中表达的感情是自然流出而非加意做作。

这里说的虽是书信，但日记也是有着这种特色的。所不同者，日记的写作，不像书信的“仓卒濡毫”，而是一天到晚，大小的事务都已完结，这时候，点起灯来，铺开纸笔，把这天的事拣一点记下来。这记录，不论是达官显宦的，还是普通百姓的，若干年后回过头看，就成为一种有用、有趣的资料。原来不拟印行的私人日记，一旦公之于众，片言只语中常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让人大吃一惊的地方也定当不少吧！

除了“私”和“真”，“琐”恐怕也要算书信和日记的一种特色了。

历史上的大事件，书信和日记不是不可以记，但那更多的是官书的事，志在立

言，意存褒贬，而非书信和日记的正宗。我们不妨拿鲁迅的日记与他的文章作个比较。鲁迅的杂文，深刻隽永，有风云之气、辛辣之味，颇多时代的痕迹、历史的面目。而他的日记，写的多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买了什么书、来了什么客等等。当初，他就这样一天天地记下去。今天，我们这么一页页地往下读，或者有人要怪其太琐碎了。但日记的特色，就在这琐碎之中体现出来了。正如林语堂说的：“论文只谈要紧事，尺牍可谈要紧及不要紧事，日记并可谈最不要紧事。惟有好的尺牍写来必似日记。谈不要紧事，方是佳翰；写无事忙信，才算知交……”

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高声大气、发空洞的议论，大概都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写出那种看似说平常琐事，却淡而有味、言之有物的东西。有一位作家就说：“身边琐事我自己最不会写，却很喜欢看这一类的文章，可是又难得看见好的。因为大抵都不够琐。”

书信和日记，都是大家爱看的东西，可惜现在文情俱佳的不再多了。所以，浏览前人的这类著作，作为思想性情的陶养或作文的预备，大概不是无益的吧。

我国大部分领土分布在北半球的中纬度温带，一年有春、夏、秋、冬鲜明的四季划分，而春是四季之始。因为，对于我国大部分地区来说，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是大自然新一轮的生命循环的开始，《淮南子》“春气发而百草生”所说的就是这一自然现象。

在开启新一轮的生命循环过程所需要的各种气候要素中，春雨是最关键的因素。尤其在古代农耕社会，春雨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文化心理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是春耕和播种的季节，及时的春雨无异于人们的生命之水，耕田、选种、播种等都要根据春雨的早晚、降水量多少而定。在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二十四节气中，春季节气中的雨水、清明、谷雨，这三者就都与春雨有关。

春天的风调雨顺关系着全年的收成，甚至是民生和整个社会的安定。因此，人们把春雨视为神灵，顶礼膜拜。历史上，春旱时有发生，于是，人们便对天祈祷，祈祷天降甘霖，惠及苍生。《诗经》中就有对隆重祈求春雨的场景的描述。在我国漫长的农耕历史上，还常常出现久旱得雨时人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的生动情景。春雨寄托着人们朴素的果腹之愿，祈求春雨和庆祝春雨的活动成为中国农耕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中国绘画史上不少以农耕为题材的画里，春雨成为这些画作的生动背景。譬如古代有很多题为《一犁春雨图》的画幅，画中，蒙蒙春雨如膏般滋润润湿，辛苦劳作的人们无不充满了对丰年的憧憬，洋溢着恬淡自足的生活气息。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度而言，春雨的意义不仅反映在农业生产、生活方面，也反映在文化方面。尤以在文学方面的表现最为集中。数千年的漫长经历和切身体验，使我们的民族建立起对春雨的特殊情感。春雨如膏如始，泽润着经冬的土壤，及时的春雨饱含着人们对丰收的殷殷期待。因此，在一年四季的雨中，春雨常常是最能激起文人创作欲望的自然景象。各类文学作品里，文人极尽描写与赞美之能事，生动美妙地展现春雨带给人们的欢欣与希望，抒发对春雨的美好感受，赞美春雨对大地的普惠。

早在《尔雅》《淮南子》中，就把春雨称为“甘雨”，《左传》中还把春雨形容为“膏雨”。这些描述一方面表明春雨的润泽，另一方面也表明其珍贵。“膏”“润”“甘”等字眼成为文学作品描述春雨的常用词。“春雨如膏”更成为古代科举考试常见的诗赋考试题目。

著名诗人杜甫、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苏轼等，也有描写歌咏春雨的诗篇，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至今为人喜爱，传颂不已。譬如，唐诗里的“昨夜一霎雨，天意苏群物”(孟郊)，“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韩愈)，宋诗里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僧志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等，都已成为历代传颂的佳句。这些名篇佳句之所以流传至今，除了与诗人高超绝妙的艺术创作手法密不可分，还与中华民族对春雨普遍喜爱的浓重情结有关。

而在长期的生活与实践，还逐渐产生了一些固定的话语表述方式。比如“一犁春雨”，就成为古代文学作品中春耕题材作品常见的词语；宋代苏轼“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袁甫“一犁春雨趁农耕”，吕祖谦“一犁春雨沃桑麻”，金代元好问“一犁春雨麦青青”，元代胡天游“一犁春雨土如酥”，明代费元禄“一犁春雨占丰年”等等，无不体现了人们对春雨滋润田畴、惠及苍生的热情赞美，洋溢着淳朴舒润的农耕文化气息。

春雨的重要性也使之成为人们形容美好事物的惯用物象。历史上，文人、士大夫为了纪念父母，修建了很多堂、轩、亭等，他们多以春雨命名这些建筑物，如“春雨堂”“春雨轩”“春雨亭”等。这是把父母之爱、父母的抚育之恩比喻为春雨。走进轩亭，如沐春雨，俯仰之间，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亲情的温暖。

父母生育、抚养子女就像春雨滋养万物，无私奉献而不求回报。因此，人们把父母之爱、父母的抚育之恩比作春雨，亲切而通俗。早在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就有这方面的描写，庾信《周陇右总管长史赠少保豆卢永恩神道碑》中写道：“是知春雨润木，自叶流根。西伯行庆，推存及没。”其他如明代沈周《对春雨》中也有“春雨父母情，惠物侔爱子。润被发华妍，长养助欣喜”。陆云龙《寿魏侯侯文有歌时癸酉三月》中有“美哉，春之雨！物也，玄黄为大；父母，春其代大，父母以父母品汇者哉”。

除此之外，古人还以春雨来比喻君臣关系、师生关系。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地、君、亲、师是最令人尊敬与感戴的，《世宗宪皇帝圣训》卷三十二中说：“上谕曰‘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人所宜重……’”而春雨博泽众施，膏泽万物，是天赐的甘露，惠及苍生，极其伟大。所以人们认为，最为崇高的人伦关系——“君、亲、师”，就像春雨一样值得感戴。三国曹植《献诗》有“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物春风，泽如时雨”，唐代王昌龄《西江寄越弟》有“尧时恩泽如春雨，梦里相逢同衣冠”，清代弘昼《圆明园泛舟恭记》有“吾思圣恩周海内，如日月之无不照，如雨露之无不润”……

春雨润物，化育生机，为万物带来蓬勃活力，与师德、教化也有相同之处。因此，人们也常把政教感化或道德境界比为春雨润物，赞美那种默默奉献的精神。“德披春雨，教拂秋霜”“杏花化雨，程门春风”“孔席之春风，周庠之化雨”“坐春风，沾化雨”……都是人们赞美师恩、歌颂教化的经典之说。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对春雨喜爱与重视的深厚情感，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春雨已经成为能够唤起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所形成的文化共识与美好记忆。



欢迎扫描左侧二维码或搜索“rmbwby”，关注“人民日报文艺”微信公众号  
本版信箱：fk@people.cn